

XUANNAOZHONGDECHENXIANG



程欣欣 著

喧闹中的沉想

辽宁作家理论书系

目 录

彭定安例序

- 5 理论的风采
- 13 自序
- 15 喧闹中的沉静
——评《清明》辽宁青年小说家专辑
- 24 新时期沈阳小说创作概述
- 31 漫谈颜廷瑞的历史小说创作
- 46 祝爱光和他的历史小说
- 51 新颖的叙述角度与艺术表现
——读刘元举的中篇小说《黑马·白马》
- 54 把痛苦升华到一种境界
——读刘元举的小说集《人·情》
- 57 情意绵绵的世界
——评刁斗的几篇散文

- 64 心中那一片新绿
——记辽宁青年作家荒原
- 71 通向理解的桥梁
——《红绿灯下的报告》读后
- 73 面对孩子们的世界
- 81 略谈《跨过命运的废墟》的结构特点
- 85 告别爱情的季节
——读长篇小说《飘逝的季节》
- 87 风起八面 情凝一方
——读中篇小说《白龙河上八面风》
- 89 谈电视剧《努尔哈赤》
- 91 篇不在巨 有情则名
- 93 《嗜好》解读
- 95 生活本来多平庸
——《琐事》琐谈
- 97 论《罪与罚》的心理分析
- 115 平民意识与贵族精神
- 117 文学的社会选择性
- 122 作家的精神境界
- 124 不妨藏一下
- 127 要有余香与回味

129	文学的有限与无限 ——对福克纳的一点思考
131	读《随想录》的随想
133	读书与知天下
135	文学：真诚的烛光
137	喜与忧 ——说说戏剧小品
139	与文学青年谈创作
143	东北大地呼唤着新的文学
145	理论评论版面在文学期刊中的地位和作用
154	“微型作家论”栏目组编稿件的体会
157	后 记

理论的风采

彭定安

1

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理论的世纪，在世纪初，就出现了各种新颖而颇有见地的新理论，涉及哲学、美学、文学、艺术、语言等等理论门类。人们以新的理论思维和新的理论建树来总结过去，并迎接新的世纪。这种新的理论表现了人类的新的智慧、新的思维，新的对世界、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开辟着新的理论天地。勃兰兑斯对法国浪漫主义给予高度的评价时说：“法国的浪漫派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然而这个伟大的文学流派在进到20世纪时，却不得不让位于接踵兴起的其他文学流派如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这是因为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文学的天地也随之发生变化，而理论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用斯宾格勒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要跟得上世界”。哲学—美学—文学的理论，在20世纪的发展，真可说是繁花似锦，各种理论各种

学派，各自在自身的领域里，同时又彼此交流、渗透、汇合以至相互补充和冲击对方，创获了各种理论体系，以此来“跟上世界”，注释世界，理解世界，也倾诉自身的认识。

这都是人类智慧之果。

这都是人类的精神发展。

2

然而，在这样一个繁花似锦的理论与学术文化的世界里，却在几乎占了整个世纪的全部时光的时期里，又划分出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阵营。这个阵营拒斥了那个世界，独自发展着自己的理论架构，并且在与那个世界相对立地、持批判态度地发展着。这就是前苏联所划出和创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理论天地里也有了独立的发展，有巨大的创获，但是，由于两个世界的割裂和对立，不能不使彼此都受到影响，从而影响了人类学术文化的总体发展。我们曾经也在大约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跻身于这一世界。文化的“柏林墙”阻隔了两个世界。然而这些伟大民族都是理论思维能力很高的民族，拿俄罗斯民族来说，那些被逐出国界的知识精英中，有不少在欧美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影响了欧洲，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贡献，几乎可以说存在一个“海外俄罗斯学派”。而在境内的受压抑的学术大师如巴赫金，既像“墙里开花墙外红”，又是“迟开的蔷薇”，在境内穷困潦倒备受压制，而学术却在欧美走红，在80年代又像出土文物似的受世界青睐。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却持一种高傲的自我封闭状态。一句话打倒一切理论：“封资修！”

于是我们对于世界了解得多么少啊！于是我们在新时期感到了人参与世界对话的困难。于是我们试图在几年

内走完人家几乎一个世纪中走过的理论历程。各种急就章的、摘译选编的理论介绍纷至沓来。于是，饥不择食，消化不良，方枘圆凿，却又产生了某种倒胃口的情形，或者碰钝了一些人的理论锐气，或者浇熄了一些人的理论热情。

但是我们仍需了解世界。

我们还要走向世界。

3

无论“了解”还是“走向”，都是双相、双向的，尤其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在属于东方文化圈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属于西方文化圈的西方现代文化之间，更是如此。当封闭的窗户打开，当我们把眼光投向海外之时，我们同时也就在宣传自己，矫正自己，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在新时期的短短的十几年中，在这种双相、双向的文化交流中，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高过以前的几十年。

在这方面，值得一说的是，老一辈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文化人，是经过了一个重新学习以至于是从头学习的过程的；而年轻一辈的人们，则是直接地接受这些新东西的。当然，这种学习和接受，在总体上而不是就个别人或一些人而言，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立足于民族文化根基的伸手向外去“拿来”。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学、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等等方面的发展和进步，都与这种“拿来”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拿来”，同我们自身社会构造、社会生活、人们心态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以至文学艺术创作与理论的变化相结合，便构成了、促进了这些年来人们在思想上、理论上、批评实践上以及学术研究上的活跃。

虽然难免会出一些不理想的事情以至偏差，但在总体上是前进的，向上的，具有了生机，具有了思维与文化的生长点。

这方面的成绩表现之一就是：一部分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和文艺批评工作者的成长。他们已经不再是手拿一把过于狭隘的批评和理论的卡尺，去硬性地量作品，从而得出一个预设的结论，他们也已不再是“只看内容”，“不管形式”，即不问艺术创造的成败，把“意义”和“艺术”割裂开来了。他们也拥有一份自己的独立思考了。这些都是可喜的。当然，如果从严要求，或者在理论上求其更为成熟，也许会发现一些问题。但这在科学上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应该说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成长过程中，谁能无过呢？

现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这套《辽宁作家理论书系》，不仅“以群体的理论”方式出书，以一种整体性理论文本问世，是颇有特点的，而且，以此种书系之能够编选出版，反映了一种文化的与文学理论的态势：一是在理论上能够形成一个年轻的群体，反映了理论思维的群体性和群体性的收获；二是这个理论的群体，并非“纯理论”的，除几位专事文学理论研究外，作者阵容还包括有小说家、诗人、编辑家、大学教授，这在诸多方面都会给理论注进生机和新气象。

而且，在这些多彩多姿的理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有对于作品、作家的评论，有对于文艺现象的评述，有对于文学理论的学术性探讨，也还有一些专题研究，有对传统的阐发，也有对新理论新现象的前沿性探讨。这构成了这套书系的可持续性、社会性、理论性，自然也就铸就了它的价值斤两。

在本世纪初，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德国的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完成了他的巨著《西方的没落》。大战结束，他的著作出版，立即轰动。也许是这本书的书名同它的实际并不一致这一点，为它的轰动效应开辟了“市场”。因为他在论断西方的没落时却同时肯定了“西方文化尚未走到尽头”。

当 20 世纪进入七八十年代之交之际，当代美国重要的学者与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写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指出高科技已经变成当代人类的图腾，而文化商品化的趋势严重，经济主宰着社会生活。面对这种三重压迫的局面，“现代派文艺理论与作品中，常见的现象是返祖和反理性。艺术家们追溯原始，顾念传统，表现现实性生活的荒诞谬误，并且超越时空地征用和重组全部人类文化遗产”。然而贝尔更郑重提出的则是，“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有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它方相对合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三联书店 1989 年）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丹尼尔·贝尔解决当代西方文化矛盾的一服药方。但是，这是否为一剂良药，正如他自己所说，“其答案在历史的法庭上”。不过，他的把经济的“养育之恩”纳入文化的价值体系，这是颇具新意而令人首肯的。我们面对自己当前的现实社会心态，对此点更深为感触。

在 80 年代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写了一本书：《新现实——走向 21 世纪》（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

版)。他在前言中，劈头一句话就宣布他这是“关于‘下一个世纪’的著作”，因为他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下一个世纪”——按他的理论见解两个世纪的分界年限是在1973年。

我们在所回顾这段从世纪初到世纪末到“理论上的下一个世纪”的学术文化发展和几本代表性的著作及其主要论点，目的在于对理论的星空作一个一瞥式的迅速扫描，以此而引发一点思索。

虽然在世纪初就有学者发出“西方的没落”的惊呼而又肯定“西方文化仍未走到尽头”，而且，在20世纪理论上还相当活跃，文化亦有大的发展，但是问题仍然很多，预示着人类在文化上遇到的矛盾。而据贝尔的看法，这矛盾则是经济主宰了一切，高科技又造成负面效应，文化又在日益商品化。这一点则是令人深思的。贝尔的提法是有道理的：文化养育了经济！人类的麻烦，人类的文化矛盾，也许就在于在经济——文化两相构造中，文化被轻忽了、弃置了，不合理地物化了，等等。

这是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文化语境的视点？

我从这一点考虑，对于现在出版这一套青年作者们携手问世的文学理论书系，感到欣慰以至欢快，这至少是对文化的一种关注、一种投入、一种热情。当然我们清楚这只是“杯水”，但不管作用多大，这是一种态势的显示。这是在现代大众文化喧嚣声中的一缕清音。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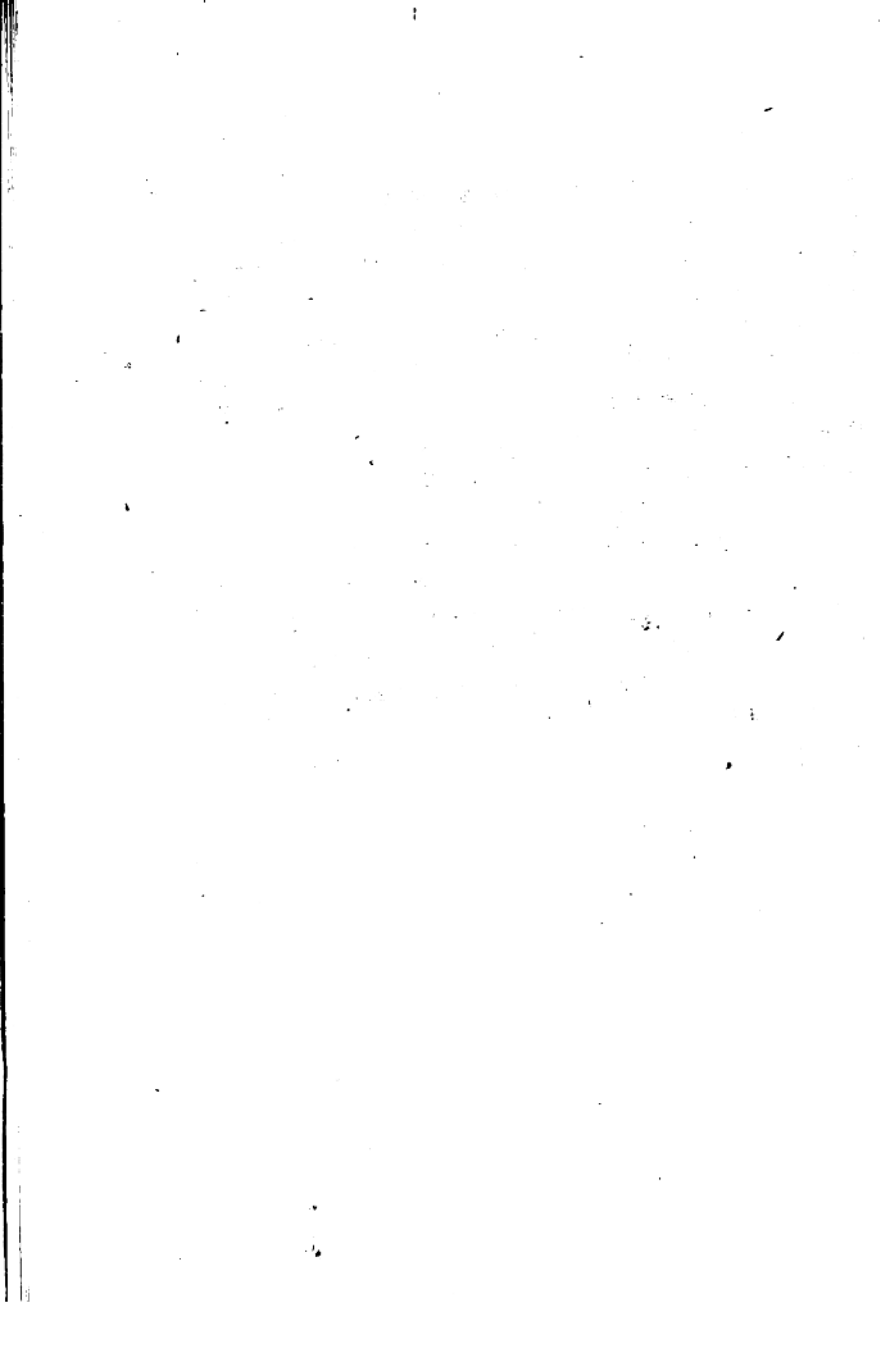
也许是我个人的偏爱，我觉得理论思维不仅对于一个民族是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对于每一

个人来说，也都是重要的，无论他从事何种工作。理论——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直觉思维，这是每个人都运用的思维方式，只不过有的人某种思维方式运用得更突出，效应更高，有的人则长于另一种思维。但不会有人只运用一种思维方式。因此，对于从事文化领域中的各种工作的人来说，在“业余”，从事些理论思维的生产，比如写文艺理论、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文章，是很有好处的，这不仅锻炼了自身的理论思维能力，而且可以联动式带起其他思维能力的发展。同时，这种思维的产品，也可以有益于别人的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赞赏这套书系的出版。

在我们面对 21 世纪，或如彼德·德鲁克所说，当我们已经在理论上进入 21 世纪时，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发展和提高。可以预言，21 世纪将会比 20 世纪更加是一个理论的世纪，而且会是新的理论出现和理论大更新的世纪。

1994 年 12 月 6 日



自序

也许是工作的需要，在做了十年评论编辑的同时，多少写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文字。我知道自己不是专门做理论研究的材料，对这方面拥有的智慧和才能从一开始就抱有怀疑。因此，在大学读书时，最不喜欢的课程中就有文学概论。记得当时不知怎么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想做一辈子。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所有的课目中，我的文艺理论课的成绩却最好。现在想来，这除了我做事一贯认真，只会按部就班地学习之外，还有就是我的朋友季红真的影响。她思维敏捷，学识渊博，在学校时就相当出色。那时，我经常和她一起去哲学系听黑格尔的《小逻辑》，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每逢周末，还有文科学学生会组织的各种讨论会，是关于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学等学科的专门性讨论，也密切关注现实。我们常去参加。这种潜在的影响对我以后理论兴趣的形成应该是个契机。

每个人在社会中能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也常常想，做评论编辑是我最需要的吗？与这个被人们称为“灰色的”理论世界长相厮守是我倾心向往的吗？每每总有无法排解的枯燥和寂寞涌上心头；有啃读一部深奥的理论巨著时的头晕和目涩，有研读一部作品理不出头绪时的困惑与混乱……在与窗外鲜活而生动的喧嚣声

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往往就失去了耐性。

然而，当你一旦领悟了理性思辨对纷繁复杂的感性生活的概括达到的透彻和深邃，一旦破译了作家心灵深处不为人觉的重重密码，还能够对作品的人物、情节、语言、结构有独到的理解，条分缕析地排列出秩序和层次，使之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这时获得的愉快，即使是些微的，却无与伦比。

我用十年的时间体会到这些，不能说是尽心尽力了，因为毕竟还有其他的事情必须要做。书是读了一些，但真正研究的却很少。除了前面说到的对自己不信任外，还有些懒惰，多半在朋友的督促下，才写些文章，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文章写得少，但做编辑工作却相当认真。这是我的个性使然。今天，每当我有机会沉浸在思考的无与伦比的愉悦中时，总是想，今后不仅这份工作要好好做下去，文章也还是要经常写的。

1994年秋

喧闹中的沉静

——评《清明》辽宁青年小说家专辑

进入70年代后期,辽宁的短篇小说创作曾经在全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金河、迟松年、达理、邓刚、张涛、边玲玲、于德才、谢友鄞、林和平、马秋芬、孙惠芬、刘元举,以及王中才、刘兆林等一批军旅作家,以其较为强劲的现实主义意识和创作实绩,卷起了一股持续近十年之久的“东北风”。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关注现实的热情,以及浓厚的乡土风味,形成粗犷沉实的文风,以致新时期文学史不能不留下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名字。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历史转型期的深入,辽宁的文学创作也同全国一样进入相对岑寂或曰平实的阶段。一部分曾经成功地显示过短篇写作才华的作家,也已迈入了人生中年,开始了更为宏伟的、更能承载其智慧和人生体验的长篇小说的营构。但由于马原等人的加盟以及一批新人的日渐成熟,辽宁的短篇小说又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新的一批小说作家试图走出严格的社会角度与强烈现实感的窠臼,力争改变重题材而轻技法的旧制,进行了大力的转轨实验,从而形成了与东北地域文化相伉的,在凝重、粗犷基础之上兼蓄多种表现手段的多元面貌。

这个“专辑”中的六位作家,就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辽宁青年小说家中坚。

就这批作家的主体素质来说,他们的生命历程并没有

融注更多的苦难，被认为是重要的创作源泉和动力的人生曲折坎坷，他们望尘莫及。不要说生生死死刀光血影右派劳改妻离子散……就是平常生活中较大的行为挫折他们也所历不多。他们走出大学校门才十来年，这十来年里，他们更多地是与文学打交道，对书本的热情始终未减。“生活体验”在他们那里，除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无法磨灭的印迹之外，便只有文学大师们的眼界与他们身边琐事比照后所形成的感悟了。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拥有过同龄人所鲜见的舛运，他们认为写小说需要的是天份而不是经验，虽然这些三十几岁的作家都有了差不多十年的写作尝试。他们更愿意依傍心灵的感应而不是生活的跌落，他们甚至认为“想一想也是一种经历”（白小易语）。他们大都在大学里受到过系统的文学训练，在希望成为作家的同时更希望成为一个文化人。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必然带有知识的品位与趣味。

刁斗的小说近一二年才被重视，过去人们曾记住他作词的校园歌曲和一批情缠意绵的散文。这个几乎没受过任何水火熬煎的聪慧人将自己小说写作的出路寄托在形式意味的探求上，他试图脱卸传统观念所提供的视角而寻找自己的世界，生活之于他已然变成精神的东西。他不肯摹写平常的生活现象而赋予生活以平常的意义，他尽力在有限的视野里制造新鲜的境界。中篇小说《新婚中的恐惧》（《十月》92年）通过一个大家族众多子女的生育透视，展示的是人类生态的深刻命题。《城市浪游》（《小说家》92年）中那个被开除的大学生在故乡城市一天的经历，《最后一枪》（《芒种》92年）中扑朔迷离的神秘氛围，都昭示着他对西方现代小说的技法兴趣。他对所写的故事并没有亲身的体验，他的才华体现在把这些故事特别是一些细节弄